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学思录

高新科技与未来社会

高新科技的深入发展，将为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直接的必要条件。具体来讲，高新科技是智慧产业，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扩大了生产与流通的范围， 劳动成果大都面向全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能吸引广泛的社会参与。

□ 赵　奇

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大机器引起的工业生产革命以及由此给欧洲国家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作了许多生动而又深刻的描述：“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不只是在《宣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对当时的新科学、新技术，都给予了敏锐而具体的关注。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人类思想的促进作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曾说过：“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鲜明地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三大科学发现成果：细胞的发现、能量转化、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对这些科学发现成果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了充分阐述。

当今时代，科技发展的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以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高新科技，正以迅猛发展的势头，深刻地改变着当今世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其影响的深度、广度、时间的长度，都将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场深刻的革命。

那么，高新科技发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我的看法是：高新科技的深入发展，将为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直接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自由的联合体”，一般来说，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劳动不再成为人们谋生的唯一手段，劳动将成为人们个性伸展的表现，成为人们的精神享受。第二，社会分配不再是按劳分配，而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第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

如果我们对以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高新科技对社会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我们就很容易地找到高新科技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联系。

第一，高新科技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高新科技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过去简单劳动需要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劳动量，现在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和很少的人力就能完成。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我国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运算1小时，相当于13亿人同时用计算器计算1000年。可以预见，高新科技的广泛运用，必将把人从更多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长时间的繁重劳动将越来越少。同时，高新科技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将是过去简单劳动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人们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但获得的收入却随着社会总收入的增加而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因此，人们将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财富。

第二，高新科技是智慧产业，这与过去的手工产业、粗放式的大工业产业有着本质区别。高新科技产业更多重视的智力劳动和创造性思维，人们投入更多的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智力劳动。而且，正因为高新科技倚重的是创造性思维，这就需要人的个性充分发挥。这样，人们在高新科技产业中从事的劳动更多的是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主动劳动，而不是违背自己意愿的被动劳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成为劳动者发挥智慧的精神享受。人们在享受自己的创造性思维愉悦的同时创造了社会财富。

第三，高新科技创造的劳动成果大都是面向全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互联网上的免费软件将会越来越多，在同一平台上，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共享的东西越来越多。就从软件这一范围来看，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财富的按需分配。今后，随着互联网等高新科技运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包括物联网、智慧城市等等，以及将来许多我们目前难以想象的应用，这种社会财富按需分配的状况将越来越广泛。

第四，高新科技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参与的广泛性。人人都可以通过高新科技创造的各种平台和技术手段，参与到其中。现在，网络上许多软件尤其是一些实用生活型软件大都是网民自己创造、自己挂上网的，至于通过微信等平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可以说，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科技这个平台上，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创造者，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自由发展，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成为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五，高新科技扩大了生产与流通的范围，使世界不再有偏僻的角落。通过互联网，城乡连成了一片，即使在最偏远的地方，只要有电、有通讯线路，就能与世界联成一片。通过淘宝网，富裕的江南地区农民能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贫困的西部山区农民也能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世界。互联网不仅推动了全球化，更缩小了城乡差距，准确地说，是缩小了“三大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

从这五个方面简单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高新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高新科技的发展具有几何级增长的特性，今后将成为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今天是难以预测的。正如恩格斯当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自己所处时代描述的那样——“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么，以前的一切时代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那么，可以设想，未来时代的思想家又会怎样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呢？显然那时候的生产力将更加发达，生产关系将更加高级，对比之下我们今天的许多思想将必然变得十分浅薄。所以，上述这些关于高新科技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联想，只能是推论，而结论则只能在未来的时代产生。

用典释义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讲话原文】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9月3日）

【出处】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诗经·大雅·荡》

【大意】

帝王骄纵放荡，不遵守法律制度，他却是下民的君主。帝王贪心又暴戾，发布的政令也多有邪僻。上天生下的众民，本来都是善的，但因出生后面对着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很少有人能以“善道”而自终。所做的事情，往往都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却很少有能够坚持到底、善始善终的。

【延伸阅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有305篇，故有“《诗》三百”之说。根据乐调的不同，《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本义为乐调，是指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主要包括了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15个地区的土风歌谣，共160篇。“雅”，古时释之为“正”，即正乐，指的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按音乐的不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部分，《大雅》全是朝会乐歌，《小雅》多是贵族宴享时演奏的乐歌，共105篇。“颂”是一种宗庙祭祀而用的、舞乐合一的乐歌，包括了《周颂》《鲁颂》和《商颂》三部分，共40篇。

《诗经》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同时，《诗经》也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与《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并称为“五经”，是传统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

（任松峰）

王阳明不为科举而读书

□ 牛冠恒

科举时代，大多读书人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并力争中举做官。读书人为科举而读书，对于国家来说，可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大发感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旧时读书人为科举而读书，本无可厚非，因为读书可以给读书人带来丰厚的回报。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劝学篇》说得非常诱人：“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但也有少数不为科举而读书的人，明代的心学大家王阳明便是其中一例。王阳明11岁在京师读书时，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不认同塾师的看法，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读书学圣贤”虽是王阳明年少的追求，但处于科举时代，他的父亲王华还是科举状元，他也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谁成想第一次会试便没考中，当同考的人为落第而感到羞耻时，王阳明反而安慰他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第二次会试，王阳明又没成功，直到第三次时，他才以会试第二名、殿试第十名登第。

王阳明天资绝伦，读书过目成诵，处在科举时代，三次参加科举，既有失败的经历，也有成功的体验。他一反当时大多数人为科举而读书的目标，年少时便立下“读书学圣贤”的志向，并把它当作一生的追求，既成就了他心学大家的地位，也为后世树立了读书的榜样。



王阳明

“读书学圣贤”是王阳明年少时立下的志向，如何才能实现？通观王阳明的著作，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读书学道”。读书学道，又叫读书穷理。道是什么？理是什么？王阳明主张心学，在他看来，心即理，心即道，心的本体是至善，是良知，“至善是心之本体”，“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圣贤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圣贤悟到了良知并按良知行事，因此，读书学道，就是通过读书悟到自己的良知，“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

读书学道，说起来容易，但实行起来，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与科考的关系。因为处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不可能回避科考。当时就有人问他：“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意思即是在读书的时候总是想着科考，怎么办？王阳明的回答是：“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王阳明认为，只要悟到了良知，读书与科举并不相妨，读书时心也不会为科考所累。

王阳明一生最爱读书讲学，他曾说过：“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未尝拒之。”当时有很多人跟着他读书学习，因他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不同，而当时科举考试主要以朱熹学说为标准，所以就有学生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跟着王阳明读书学习会影响科举考试。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曾经带着他的弟弟一起跟着王阳明学习，他们的父亲就担心说：“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钱德洪和他弟弟反而劝他们的父亲说：“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钱父还是不信，就去问王阳明，王阳明明确告诉他说：“岂特无妨！乃大益耳。”刚好第二年是大比之年，王阳明的几个学生科举中举，钱父这才相信钱德洪的“打蛇得七寸”并不是虚言。

王阳明的不为科举而读书，既不排斥科举，又能按自己的良知行事，从而使他成为一个“上欲以其学辅吾君，下以其学淑吾民，惓惓欲人同归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苍生”的圣人。不仅如此，他还以此来指导学生，在科举时代成功走出了一条“读书学圣贤”与“读书登第”两不误的读书之道。王阳明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也一再强调教育孩子读书，“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悌而已”。“教之以孝悌”即是“读书学圣贤”，因为孝悌是“为仁之本”。

名家治学

家国情怀与学术水准兼备的爱国讲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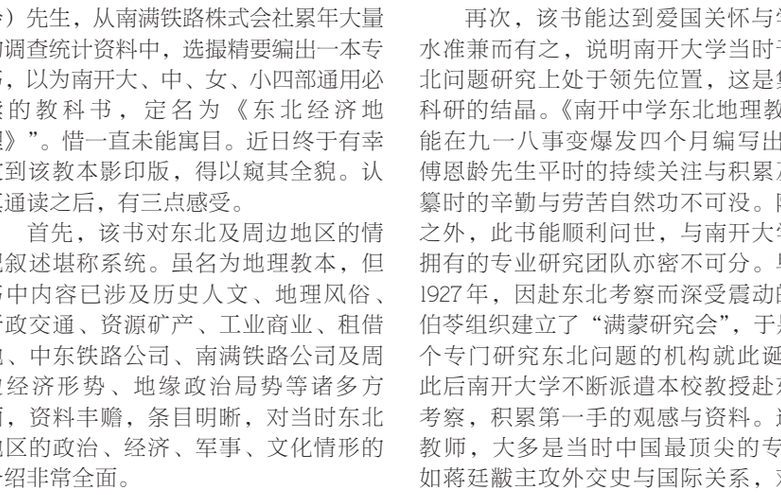
□ 王学斌

记得尚在读博期间，我曾翻阅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首次了解《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一书。曾就读于南开中学的何氏，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彼时南开校长张伯苓注意到日本对东北地区的野心，“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早已嘱咐校长秘书、精通日文的傅锡永（恩龄）先生，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累年大量的调查统计资料中，选撮精要编出一本专书，以为南开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读的教科书，定名为《东北经济地理》”。惜一直未能寓目。近日终于有幸收到该教本影印版，得以窥其全貌。认真通读之后，有三点感受。

首先，该书对东北及周边地区的情况叙述堪称系统。虽名为地理教本，但书中内容已涉及历史人文、地理风俗、行政交通、资源矿产、工业商业、租借地、中东铁路公司、南满铁路公司及周边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局势等诸多方面，资料丰赡，条目明晰，对当时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形的介绍非常全面。

其次，该书对东北之于中日、远东乃至国际格局的影响，以及如何解决东北问题的探讨都极为深刻。全面而客观描述东北情况已属不易，在此之上再加以精到点评，确实难上加难。《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做到了这一点。正基于对资料、数据、舆情的充分搜集与占有，故教本中所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如第十五章结论部分，编者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消极与积极两套方案，战略眼光可谓长远，同时着手之处又非常务实。文末编者更是强调，“东北之权益，既由吾人失之，故东北所失权益之规复，其责任亦应由吾人负之。简言之，东北问题之解决，在于吾人者多，而在于他人寡。中国建设成功之日，恐即东北问题完全解决之时也”。这一段饱含爱国热忱的有温度的文字，可谓点出了东北问题症结之所在。

再次，该书能达到爱国关怀与学术水准兼而有之，说明南开大学当时于东北问题研究上处于领先位置，这是集体科研的结晶。《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四个月编写出来，傅恩龄先生平时的持续关注与积累及编纂时的辛勤与劳苦自然功不可没。除此之外，此书能顺利问世，与南开大学所拥有的专业研究团队亦密不可分。早在1927年，因赴东北考察而深受震动的张伯苓组织建立了“满蒙研究会”，于是一个专门研究东北问题的机构就此诞生。此后南开大学不断派遣本校教授赴东北考察，积累第一手的观感与资料。这些教师，大多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专家，如蒋廷黻主攻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对近代以来中俄、中日问题甚为谙熟。通过实地走访，蒋认为“东北的政治措施，乃至全国的政治措施都是不够的。军政两界的爱国分子都认为兵工厂、铁路、出超的贸易是强国的条件。但是，他们忽略了健康、受过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强国的基本条件”。再比如擅长中国工农业经济问题的何廉，一度致力于研究河南、山东百姓向东北迁移现象，他“越来越感觉到研究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机构，是极为重要的”。于是他借助赴东北考察的机会，搜集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用于该课题的研究。此外还有方显廷、萧公权、张彭春等人也从教育、政治、财政等角度探讨东北问题。应该说，这些一流学者的成果，对于《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的编写大有裨益，他们的不少观点在书中皆有所体现。因此教本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南开大学众多知名学人集体学术智慧的结晶。与此同时，正是由于“东亚研究会”以及编写教本的契机，不少学者将东北问题作为毕生关注的重点。如蒋廷黻于1929年离开南开后，依然在该领域努力耕耘，发表了长达数万字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文，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可见，这批学者不仅学识湛深，并且时刻关注现实，未把眼光仅放在一校、一地，而是胸怀天下，他们携手构建了一种学术共同体、志业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



书名：《八十四年前的东北地理教本》（上下）
作者：傅恩龄 编
出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总体而言，《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一书体系全面宏大，内容丰富精确，无疑是一部体现了当时东北问题研究前沿水准的上乘之作，其学术价值之高自不待言，如何深入挖掘该书背后所隐含的学术背景及所蕴藏的现实意义，仍值得关注。

书海泛舟